

邓小平对解决澳门问题时机的把握

澳门今天迎来回归祖国25周年。与解决香港问题一样,解决澳门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下进行的。不过,澳门回归祖国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与香港有所不同,针对其特点,邓小平特别注意把握解决澳门问题的时机。

“拖一下”的玄机

澳门历来是中国领土,但自1553年起,被葡萄牙非法占据达446年。不过,相较于鸦片战争后才被英国占据的香港,收回澳门的主权和管治权却不那么复杂。因为香港问题是英国政府先后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割让和租借香港的土地造成的。澳门方面,虽然在鸦片战争后葡萄牙政府也曾向清政府提出一些不平等条约,使其管治权合法化,但其承认澳门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葡方只是“永驻管理”,这为中方提供了有利于收回澳门的前提。

1974年葡萄牙发生革命,之后宣布实施非殖民地政策,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而不是葡萄牙殖民地。1979年2月8日,中国和葡萄牙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时就澳门问题双方达成原则谅解,同意“澳门是中国领土,定将归还中国。至于归还的时间和细节,可在将来认为适当时候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1987年,在《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前,邓小平向葡萄牙总理卡瓦科·席尔瓦阐释:“就澳门问题来说,解决的条件早已成熟,你们早就想把澳门还给我们。我们拖了一下,主要是当时对用什么方式解决澳门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因为解决了澳门问题,香港、台湾问题怎么办?”他还指出:“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

西周时期,姜太公受封于营丘(后改称临淄),建立了齐国。他移风易俗,发展工商业。在渔盐之利的带动下,齐国成为当时的经济大国和文化中心。齐国的原住民以东夷人为主,他们生性尚武,剽悍好战,齐国人继承这一特点。春秋时期,齐庄公经过选拔,招募了一批技能全面、作战勇敢的士兵。为了激励士兵,齐庄王设立勇士爵位,以此表彰在战场表现优异的士兵。齐桓公在

可见,“拖一下”的玄机在于,在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过程中,中央采用的是先难后易,首先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的战略。实践证明,经过复杂斗争实现了香港问题的解决,同时也为澳门回归提供了成功、生动的范例,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方案,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邓小平于10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规模达200人的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其中包括澳门立法会议员、出口商会会长吴荣恪,他在活动快结束时请邓小平谈一下澳门的问题,邓小平向众人说明:“澳门问题的解决,想用香港的方式,我们以前不讲,是不要因为澳门问题影响了其他。澳门问题的解决当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国两制’。”这是邓小平就解决澳门问题的原则和方式首次公开表态。

邓小平的表态迅速引起澳门居民的热烈反响。尽管对“一国两制”普遍接受,但澳门人长期被排除在政府管理之外。比较缺乏治澳的人才,存在一定的不安情绪。于是,邓小平时隔两天再次发声。

10月6日,邓小平会见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夫妇时说:“澳门问题也将按照解决香港问题那样的原则来进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变等等。澳门收回后,赌业可以继续下去。”

不容许“拖”的宣言

1985年5月24日,葡萄牙总统拉马略·埃亚内斯访华,邓小平对他表示:“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这时,关于收回澳门的时间实际也有三种考虑:一是早于香港,二是同时收回,三是晚于香港,错开一

点。邓小平倾向于第三种考虑,但是主张必须在20世纪内解决。这是在中葡谈判开始前就已经确定了的。

中葡两国政府就澳门问题的谈判自1986年6月30日开始,用时八个半月,共4轮。双方存在两个比较大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澳门回归的时间。

中方在谈判启动时即提出:比香港回归晚一年,1998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但葡方却要求在葡占领澳门450周年,即2003年归还澳门。

邓小平看清了这一情况

链接

葡萄牙为何打算拖延澳门回归日期

周南是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当时,中葡经历了四轮谈判。前三轮谈判比较顺利,1986年11月17日,周南应邀访问葡萄牙,受到了总统苏亚雷斯接见。周南回忆说,当时接见时,“不要任何人陪见,葡萄牙方面就我一个,中国方面就我一个。他说,澳门的回归不能在本世纪(20世纪)内,这个时间太短了,要到21世纪的适当时候(再回归)。”

一听这番话,周南立即表示不悦,回答苏亚雷斯说:“听到阁下这样的讲法我很惊讶,因为贵国的谈判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在私下磋商中同意了在本世纪内交还澳门,怎么你们又提出异议?”苏亚雷斯仍辩解:“如果我们的代表团团长这么说了,那么那只是他的个人意见,并不是我们政府的决定。”周南反问:“我从事外交工作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国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在重要会谈中讲的话不能代表本国政府。如果按照阁下这样的说法,那么今后我应该跟谁去谈判呢?”

讲到这里,苏亚雷斯僵住了。周南说:“你们再认真

考虑,我就告辞了。”日后,周南回忆说:“我们不能屈服于压力,所以除了明确表态之外,我得给对方也施加一点小小的压力,表达我们的不快。第二天本来安排参观几个景点,我说疲劳了,通知葡方明天的参观项目取消,我要在旅馆休息。当夜我也把这个情况写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发回国内。”

这个让周南颇为震动的变故,其实也是出于葡萄牙政府的牟利之心。原来,在当时的葡萄牙政府中,有些人错误地认为香港回归中国之后,部分外资将会从香港迁到澳门,如果晚十几年再将澳门交还给中国的话,葡萄牙方面可能会由于外资的进入而获得巨大利润。

摸清这一情况后,周南决定立刻给葡萄牙方面施加压力,取消了第二天的游览行程。此举引起了媒体和外界的纷纷猜测,不敢冒险破坏协议的葡方不得不再次邀请周南进行会谈。

在葡萄牙短暂停留之后,周南立刻返回北京。周南以及中国外交部随后的强硬态度,使得葡萄牙国务会议终于同意在1999年将澳门交给中国。

时联

然而战争的胜利,并未转化为现实的红利,相反,由于齐愍王的四面树敌,招致五国伐齐。齐国的穷兵黩武,造成国内经济不堪重负,综合实力迅速衰落。而齐国内部王室和士族之间内斗不止,齐技击沦为政治游戏的工具。同时,依靠物质激励形成的战斗力,难以维持长久。最终,这支战国时期组建最早的“特种部队”,走向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文堂

齐国“特种部队”何以衰落

齐威王时期,重视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更新武器装备,重用能臣干将,齐技击的实力进一步提升。齐技击在桂陵和马陵击败魏军,硬生生将魏国拉下霸主宝座。有了齐技击的强势出现,齐愍王先后向韩、楚、秦、燕、宋等国发起战争,将齐技击的声誉推向顶点。

然而战争的胜利,并未转化为现实的红利,相反,由于齐愍王的四面树敌,招致五国伐齐。齐国的穷兵黩武,造成国内经济不堪重负,综合实力迅速衰落。而齐国内部王室和士族之间内斗不止,齐技击沦为政治游戏的工具。同时,依靠物质激励形成的战斗力,难以维持长久。最终,这支战国时期组建最早的“特种部队”,走向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文堂

陶行知当衣办学

1938年9月,陶行知决定创办一所“难童学校”,专门接收和培育那些流落街头的难童。

1939年7月,从香港回到重庆不久,陶行知便在重庆合川县地处偏僻的古圣寺创办了一所难童学校,取名“育才学校”,并担任校长,学生中有革命烈士的遗孤,也有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学校虽然条件艰苦,却吸引了很多知名学者前来教学和兼课。音乐家贺绿汀、电影艺术教育家章泯、诗人艾青、舞蹈家戴爱莲、画家陈烟桥等分别担任各组组长,翦伯赞、何其芳、丰子恺、田汉、姚雪垠等知名学者也常来学校兼课,学校师生最多时有160多人。

由于学生人数不断增多,育才学校的办学经费经常捉襟见肘。陶行知经常要四处奔波筹集办学经费,还写信向各界人士求援。梁漱溟、陈嘉庚、李公朴等民主人士都给育才学校寄过钱和物,周恩来、邓颖超等革命家也多次派人送来办学所需的物资。尽管有各界援助,陶行知的办学之路还是步履维艰。

一次,运送物资和粮食的汽车在路上遭遇日军,不得不绕道多走了几天的路程。而此时育才学校已经钱尽粮绝,百余名师生面临断炊挨饿的局面。陶行知情急之中把衣柜里几件八九成新的呢料大衣和裤子拿去县城的当铺,换成钱买了粮食和蔬菜,总算解决了全校师生一天的口粮。

陶行知能筹集到的办学经费越来越少,他不得不频频光顾当铺,当一些私人物品以解燃眉之急。后来陶行知家徒四壁,仅剩下一套衣服。每次洗了衣服后,由于没有别的衣服可替换,陶行知冬天就围着被子在床上看书,夏天就光着膀子在桌子前写字。等衣服晾干后,再穿上去给学生们上课。

育才学校坚持办了7年,直到抗战胜利、内战爆发时才被迫终止。7年间,育才学校共招收了600多名难童学生,后来,其中300多名学生参加了地下党,43名学生参加了华蓥山游击队,有21名学生成为了革命烈士。佟雨航